

拒绝“中国威胁论” 反对“中国傲慢论”

国家决断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抉择

RESOLUTIONS
FOR THE STATE

THE STRATEGIC CHOICES
FOR THE RISING CHINA

高全喜 任剑涛等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国家判断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抉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决断：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抉择 / 高全喜 等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

ISBN 978-7-5057-2673-4

I. ①国… II. ①高… III.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4736 号

书名	国家决断：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抉择
作者	高全喜 任剑涛 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 开 14 印张 15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673-4
定价	2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序：国家，在决断关头

任剑涛



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崛起，呈现为两个大的历史断面：1949年的历史断面，显现了自身发展衰颓、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国家状态的终结。1978年的历史断面，显现的则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寻找到富强之道，重新建构国家实力的状态。前一断面的意义当然不容小觑；后一断面的价值更是值得重视。但前一个断面仅仅凸显了国家独立自主的政治画面，而国家的富强之道隐而不彰；后一断面虽然展现了国家富强的道路，但中国能否在这一道路上披荆斩棘、开辟新路，从而真正使中国完成民富国强的现代转型重任，显然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艰苦努力的绵长过程。

在比较现代化的宏大视野中，现代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先发内生的现代化国家树立了现代典范，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交相作

用的现代体系呈现给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但对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来说，是不是认同这一现代典范，已经是一个各取所需、欲迎还拒的复杂状态；而且即使认同这一典范，究竟如何切近地将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传统和转型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并顺畅地推进自己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也是一个充满着戏剧性的艰难转变过程——在某些现代要素的外部供给和内部需要的基础上，后发现代国家的局部转型常常可以迅速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功。然而从总体上讲，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要想实现整体的现代转变，既充满艰难险阻、又存在无尽变数。因此，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随时随地需要对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断：在每每遭遇这样的决断关头时，后发国家要么突破转变瓶颈进入现代国家行列，要么眷顾转变前夕的体制好处而打回衰变原形。这种国家决断，是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在国家建设中最难以妥善解决的难题，但也是这样的国家无法回避的国家建设宿命，更是这类国家官方、学者与民众受到严峻考验的国家建设的头号问题。

无疑，中国崛起了；同样无可怀疑，中国还处于国家建构的艰难转型时期。中国的崛起，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国家的经济能力有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提升。如果说现代国家的发展是由经济作为引擎的话，中国的崛起在这里就获得了最强有力的证据。只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不再是简单依靠经济因素就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事情。无论是人们解释“西方的兴起”、还是关注“中国的崛起”、或是总结“拉美的失败”、抑或分析“日本的停滞”、讨论“美国的衰落”，无不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甚至传统、习俗纳入到论述中间，否则得出的结论就绝对地不可靠。只有在这样的综观分析视野中，人们才足以论断一个国家在国家间竞争中的优劣处境，并将这个国



家的发展前景凸显出来。就此而言，中国经济总量的做大固然可喜，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遗留下来的大量未决问题，也已经突兀地摆在了国人面前，既不容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轻忽，也不容学者们轻率地处置，更不容民众轻快地否认。事实上，中国是不是能够处理好诸如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处置好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寻找到粗放型经济之外的崭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和明显制约中国的当下发展，以至于它们随时在敲打国家领导人、社会精英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心门，要人们给出合理的解释与解决的方略。

中国的崛起，自此受制于国人对国家现代转变中未曾解决好的基本战略问题的决断。

这一决断，首先是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决断。无疑，在中国现代转变的初始阶段，中国人坚韧地选择了令自己曾经十分痛苦、难以适应的市场经济。30年的计划经济，曾经是中国人习以为常、至今仍然使部分人无比眷恋的经济形式。供给制曾经给人最大的“低级”满足。市场经济则使中国人陷入竞争性获得生存发展资源的“高级”烦恼之中。在低级满足与高级烦恼之间，中国人终于觉得选择令人心神不安的高级烦恼还是好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低级满足。问题在于，当中国人选定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资源获得基本模式的时候，未曾明白这一经济形态所需要的相关支持条件。尤其是国家政策的决断者曾经将这一经济形式视为孑然独立的经济形态，想象政治与社会维持原有状态不变，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把中国从贫穷状态推进到富裕境地。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地带的推进，这一想象已经成为幻想：当人们面对庞大的市场财富的时候，不公平的分配、权钱的勾结、权贵资本主义的成型，让社会处于分裂的边缘；而国家权力体系的老化、法治化状态的迟滞、公

平正义的政治体系建构的迟缓，导致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对前者，一些人曾经简单地认定，只要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分配不公就可以顺带解决；对后者，一些人也相似地认为，只要强化国家能力，它就足以解决看似困难的政治问题。今天看来，那些由政治家凸显的操作化幻想，与学者们提供的理论性幻想，均已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障碍。

中国已经不能再在不确定的、具有某种跳跃性选择便利的国家哲学境地中迟疑徘徊了。国家需要明确地选择足以支持其长期发展的总体战略。那种自淫性地认为中国可以跳出现代典范的“三界”之外，不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法门”之中皈依现代正轨的幻想，可以休矣！只有围绕现代典范的基本原型展开中国国家战略决断的运思，中国才有希望真正实现国家的崛起，完成艰难的现代转型。否则，中国就会自己将自己打回“落后就要挨打”的困窘原形。

与中国崛起的国家战略携手出场的则是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对自己国家的国际战略的整体决断，对于中国如何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尤其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登上国际舞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不能不承认，近代以来，中国就未曾理性制定过自己的国际战略。这不是中国人愚笨所致，而是中国人的近现代处境注定的事情。“弱国无外交”，这是现实主义支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最直截了当的断言。即使中国在崛起的初期，国家领导人也在尽力选择一种不挑衅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条件下做大做强国家的近路。在“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国际关系理念指引下，中国一向以二等国家的国际理念处理国际关系。这些理念自然都有它出台的历史依据。但就今天中国的国际处境来看，再以弱国自认为前提去处理国际关系，恐



怕就会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一个GDP已经稳居世界前三位的国家，任由你怎么“藏富装穷”，国际社会也不会将你拒斥在国际事务之外，也不愿让你免除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更不会失去在你这里获得所需资源的契机。因此，中国与其继续做隐形大国，不如挺身而出，以大国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既承担国际责任，也借此促使自己国家优化国家结构，以便塑造一贯的国家形象，有力担当起中华民族的国际使命。

中国的国际战略决断问题就此鲜明凸显出来。

中国的国际战略决断，同样需要抓住几个基本要点：首先，一个现代国家的国际战略，必须首先以夯实的国家战略为前提。国家战略，既涉及到前述的国家基本制度建构问题，也涉及到国家自觉地以何种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的问题。前者是一个较为单纯的国家建设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国家内部建设与国际形象建设相互关涉的问题。在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的时候，中国人习惯于以一个落后挨打的弱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历史欺凌、也可以道德化地要求西方国家偿还历史“欠债”、更可以以自己的欠发达减少支付国际组织的费用份额。但今天中国不能再以这样的国家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了。国家的历史怨恨应当被国家间的宽容理解精神所替代、国家的道德化思维应当被国家间的利益交易所更化、国家的国际退缩政策应当被进取性的国际政策所改变。总之，中国应当以更为自信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

其次，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兼综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就国际利益的国家维护来讲，中国不能以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特殊主义心态进入国际空间。普世价值、全球规制、基本制度，我们都没有必要采取一种硬性的排斥态度。需知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儒家哲学，就是建立在普

世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中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的时候，也怀抱着一一种普世主义的情怀。特殊主义常常是弱国自我维系其自恋情结的理念，它畏惧交流、害怕“拿来”、拒绝学习、恐惧融汇。特殊主义从来不支持大国崛起，或者仅支持扭曲的大国崛起。就此而言，建立适合中国崛起的普世主义国际话语，就成为中国官民共同努力的事情。而就国家利益的国际维护来看，中国必须首先融入现有国际秩序之中，进而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找寻矫正不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一种外部的指责态度不足以改变国际规则，因而也就不足以维护国家利益。“合纵连横”的外交方略不仅是一种外交政策，更是一种外交思维。

最后，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当有更为系统的理论支持和更为巧妙的外交手段支撑。由于中国缺乏自己的外交理论，因此在利用别国的外交理论的时候，常常无法保证自己的国际话语的逻辑一致性、政策连贯性和理论自治性。为此，在中国决断自己国际战略的时候，必须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研究放置到已经先行的国际经济、国家贸易与国际金融同样重要的位置来对待。而且，必须承诺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国际关系的实际处置之间相互尊重的状态。高超的国际关系处理技巧与高妙的国际关系理论联袂出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大国的标志之一。没有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引，一个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处置常常就会陷入一种前后不一的经验陷阱；没有高超的外交手段，一个国家的理论家就不足以概括出高妙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两个方面，都是中国需要加大力度补课的。

无疑，中国正面对国家战略与国际战略同时决断的艰难时刻。这一艰难决断，既受到中国发展态势的催迫，也受到中国政治运行周期的紧逼。就前者言，中国市场经济向纵深的推进，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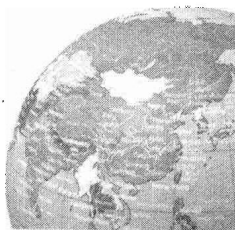


I 序：国家，在决断关头

宽松的国际环境的支持。就后者论，决定性地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处在自己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段时期，无疑需要以反思的姿态检讨第十七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国家方略与国际政策的实效，同时需要草拟中共十八大的国内外政纲。前者是中国发展态势注定的国家决断问题；后者是国家政治核心力量的运行周期决定的内政外交反思。前者长期而持续的动力与后者当下而切近的推进，都显示出国家正在进入一个决断的时期。

中国发展至今，进则有理，退亦有据。近10来年，不同主张的人们既强力申述了推进中国社会向现代规范状态进逼的理由，也强调了维护某种刚硬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依据。两种主张都有强大的理论论证，也都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前者可谓“进”的选择，后者可称“退”的道路。进退之间，“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勇相遇智者胜”的历史教诲再次回响在我们的耳畔。中国人、尤其是领导者必须以巨大的勇气、高超的智慧引导国家前行。这不是个人喜好的表达，这是历史的深沉召唤。

因应这一召唤，学界中人自然应当沉潜思考、深刻反思，以提出负责任的国家决断方案，并提供给国家领袖以决断的智性支持。这正是一批学者聚集在一起申述“中国向何处去”的看法最直接的动力。看法容有乖谬、见解或有失误、对策抑或“怪诞”，但对国家忠诚的赤子之心或可启发关注国家决断的人们？！



序：国家，在决断关头 /001

第一章 中国觉醒

一、中国这头“睡狮”

19世纪20年代，被囚禁在大西洋孤岛上的拿破仑，警告当时狂妄的英国人：“别去惊醒这头睡狮。”可英国人不予理会，随后发动了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此后中国被迫走上一条救亡图强的道路。

► 拿破仑一语成谶 /002

► 欧洲老了，美国病了，中国醒了 /004

二、“巨人”与“巨人症”

中国在快速发展，如果骨骼不长、肌肉不长，突然一下变得很大，是巨人症。没有健全的制度框架，没有强大的价值和文化输出能力，没有制定全球规则的能力，大国很难名副其实。

► 清朝“巨人症” /010

► “世界第二”像捧杀 /013

第二章 大国? 强国?

一、中国这个大国一直在有无之间

中国这个大国一直在有无之间。GDP是大国，可人均呢？制造业是大国，产品创新呢？人口数量是大国，人口素质呢？从主权角度看是大国，从人权角度看又不是……昔日的文化大国，在我们这一代也已萎缩成文化小国。

► 我们是大国，也是小国 /016

► 中国崛起的梦想与现实 /018

二、不是中国想不想当大国，而是现在全世界都把你当大国

现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有三件：应对金融危机、清洁能源、气候变化。中国能源消费量世界第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跟美国加到一起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几件事恐怕都很难解决。世界大势之一，就是不管中国愿不愿意，必须做大国，承担其相应的国际责任。

► 中国不参与，什么事都干不成 /027

► 直面全球化：丑媳妇要见家娘面 /028

三、中国崛起不是要去挑战美国

美国的地位难以撼动，崛起不是要去挑战美国。我理解的大国，首先是自己的核心利益能够得到尊重，像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新疆、西藏问题等；其次是在这个体系里的“法权”能够得到保障，不受各种超规则的指摘刁难。

► 当大国其实很痛苦 /039

► “加拿大心态” /040

► 顺从美国，就是顺从秩序 /041

► 世界变化太快，问题总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042

► 美国喜欢给全世界“下套” /043

第三章 “丛林”中的中国怎么办？

一、西方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向他们“提要求”

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时，其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写了篇文章，对中国提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多大；二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应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三是如果中国成功地做到了前两点，30年便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那时，中国将向世界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 100多年前的洋务分子说：有朝一日向西方复仇 /046

► 真正的大国，要给世界带来福祉 /047

二、以“软外交”化解“威胁论”

中国现在面临两难：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进行“权力政治”的互动，特别是发展和使用军力；为了和平发展，又必须尽可能避免其不利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开展三类不同的外交，即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

► 国际体系就像“蜘蛛网”，每个国家网在其中 /049

► 中国的实力越接近霸权国，两者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052

► 美国催生了一个金融殖民时代 /054

三、别人都虎狼式发展，中国能洁身自好吗？

不能空谈正确的东西，许多听上去正确的东西，实际上行不通。比如全球资源就这么多，几千年来中国人用很低的成本养活了这么多人，按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但西方崛起的模式是把全世界资源都采完用尽，中国怎么办？学西方，一块完，不学，自己完。这就是今天的悖论：别人都虎狼式发展，中国能洁身自好吗？

► 美国即使是狼，也要与狼共舞 /062

► 与狼共舞，还是与狼共“毁”？ /065

► 把钱借给美国，目的是要让它苟延残喘 /067

► 中国冲击及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势 /067

第四章 道德塌方与重建

一、道德是基础，苏联就是无法获得内部成员认同，解体了

道德是空谈吗？不是。康有为有一个儒家的信仰，即使陷入到“资源就这么多，我不用你也会用完”的困境之中，我也要修正你。分歧就在这，政治学家已经把道德给阉割掉了，认为都是骗人。尤其，道德是每天日常生活的基础，没有它，社会共同体都很难构筑起来，甭说跟别人打交道。苏联就是无法获得内部成员认同，解体了。

► 道德是空谈吗？ /072

► 道德问题不能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解决 /073

► 不能割裂道德和政治 /074

► 关于孔子进北大 /075

二、美国人的基督教道德水准很高，可到了国家层面，美国人最不讲道德

道德对社会内部非常重要，但到了国家层面上就很难说。美国人的基督教道德水准比欧洲人还高，很保守，可到了国家层面，美国人最不讲道德。

► 国家层面无道德 /078

► 谈道德，要多一个心眼儿 /079

第五章 检讨软实力

一、大国思维未必是帝国思维

大国思维未必是帝国思维。有人认为中国利益在扩张，应该把别的地方当成殖民地，美国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抛弃了这种思维，逼着英法从中东撤出，就已经意识到老式殖民方式已经行不通了。所以美国人才会发明“金融殖民”这种新模式。从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通过金融全球化，把全世界变成了它的金融殖民地：美国只生产美元，全世界生产用美元交换的产品。结果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不占一寸领土，就完成了全球财富大转移。

► 美国的金融殖民，把全球都套进去了 /082

► 中国要耐着性子，陪美国走完这一段 /084

二、中国要成为可持续性强国，要看它在人类基本价值上能否作出重大贡献

荷兰创建了国家主权体系的原则，英国建立了宪政体制、现代财政制度、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加上工业革命以及自由贸易体制，成了显赫的世界大国。头等强国崛起和持续的决定性条件，是具有世界历史演进意义的重大创新，否则只会昙花一现。中国能不能成为可持续的强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人类基本价值上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正义、全面发展、生态保护以及国际公约秩序方面能否突破。

► 中国要成为伟大强国 /086

►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需要创造性转换 /088

► 学会讲中国故事：把中国特色普遍化 /090

► 中国要成为“制度和文化”出口大国 /090

第六章 普世原则与国家利益

一、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应对新帝国主义和普世主义 双重张力的挑战

中国的发展总被当作特殊案例。英美很会说故事，他们的内政是基于人民原则和宪法原则，在国际秩序中国家利益优先。中国现在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面对新帝国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双重张力构成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是中国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 真正“内政优良”的大国，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 /100
- 不要否认我们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受益者，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 /104
- 国家有了钱，得让大家都沾光 /109
- 问题就出在这：什么事都由国家兜着 /111

二、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理论连他们都未必那么认真， 我们却奉若神明

在政治话语上，中国和西方几乎是鸡同鸭讲。是不是一定要全套跟西方接轨？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连他们都未必那么认真，我们有些人却奉若神明。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为什么产生？不少人完全按西方的腔调认为一是华尔街贪婪，二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缺失，真这么简单吗？

- 西方那套东西可以拿过来，但不要全盘接受 /113
- 权力施舍不出一个市场经济 /114
- 核心价值理念凝聚全民共识 /114

第七章 呼唤政治文明

一、政治文明需要共识，不能“一个理念，各自表述”

看来，国内政治学者比较悲观，对价值观和政治文明还没完全形成共识；而国际政治学者有些乐观，更多看成是操作问题。但国内面临的问题的确很多，几乎每个领域、每个环节都有矛盾、危机。

- ◆ 放弃“造反有理”的革命思维 /126
- ◆ 能否直接向“民主联盟共同体”过渡？ /128
- ◆ 世界和平不是乌托邦 /131

二、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限权可能降低效率，但能持久

谈政治文明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抢占道德制高点。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限权不是道德逻辑，而是政治逻辑。对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寄予厚望，都是非政治思维。市场规范、社会规范，权力自然就规范，这是30年来非政治幻想的两部曲，而且是主旋律。

- ◆ 在限权方面，我们“交了白卷” /135
- ◆ 政治家玩道德，不可能玩出一个强国来 /137
- ◆ 国内战略没解决好，国际战略就是空中楼阁 /139
- ◆ 谋求头等强国，不等于当下就要成为大国 /141
- ◆ 从电视片《大国崛起》看大国怎样才能崛起 /143

三、要有政治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光摸着石头过河，一辈子也摸不过去。改革者在改革之初心里都有蓝图，孙中山的“三政（军政、训政、宪政）”就是一个路线图，他不能立刻实现宪政，但至少预知了未来，这是大智慧，摆出了全民共识，且暂时不触犯任何政治集团的利益，最